

照護或控制？後帝國實驗下的麻風醫生

Care or Control ?

Leprosy Doctors in China's Post-Imperial Experimentations

陳嘉新*

Jia-shin CHEN

相較於以「歐洲」經驗定義的現代性大敘述而言，史家梁其姿認為，近代中國的麻風史提供了特別具有啟發意義的另種書寫，因為麻風的社會形象與控制，反映了同時期中國主體性的建構。在她的觀察中，這樣的建構受到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三個元素交互影響：弱勢的國家機器、精英主義式的徹底西化論述，以及反抗這種西化論述的帝國過往記憶。這些勢頭相互角力，環繞在麻風這個疾病上，構成了醫學史家華威·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所謂的「動態不斷且多地發生」的後殖民醫學史（Leung 2009: 16）。

然而，梁的專書在毛時代之後的敘述相較於帝國與共和中國時期，明顯簡略許多。在這個意義上，劉紹華的《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以下簡稱《麻風醫生》）就補上了許多珍貴的資料與分析。首先，《麻風醫生》這種以治療者為核心的書寫策略，驗諸其他以麻風為主題的研究，顯得取徑特殊。因為過去麻風研究作品，不管是由國家政策、組織發展（如病院或教會）、病患生命或社會形象著手，都似乎省略了治療者的中介性角色。本書以診治麻風為職志、上山下

投稿日期：2019年8月1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3月4日。

* 陳嘉新，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聯絡方式：jschen1973@ym.edu.tw。

海四處追著病人走的麻風醫師們為研究對象，顯得非常特別。但《麻風醫生》以所謂的「集體生命史」的取徑，細筆勾勒人物背後的時代樣貌，則又與社會史的書寫目的遙相呼應。

除了取材特殊之外，《麻風醫生》也發展出不少理論反思，值得注意。

一、相較於採用一個既成且方便的「後殖民」概念，本書採用的則是「後帝國實驗」這個術語，試圖更貼近中國的特殊情境。一方面，這個術語取代了原本泛稱的毛澤東時代，更直接地呼應該時期對於舊帝國時代的反抗與革新，但另一方面，這個後帝國中的「後」，更像是本書的幽微批判，也就是質疑這些超越帝國的嘗試是否真正地克服且終結了帝國。在這層意思上，這個「後」字也同樣是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口中後殖民的「後」字，有著「放在刪節號下」（under the erasure）的涵義（Hall 1996）。

二、前述的後帝國實驗之概念，除了質疑毛時代破除舊帝國體制的意圖，也點出了毛時代的麻風控制與先前教會醫療奠定的基礎之間的連續性。1949年以後的麻風控制之官方文獻，常常略去不提1949年之前官方或者民間與教會的合作計畫。然而，《麻風醫生》則指出1949年之後的麻風防治乃至於整體性的農村衛生發展，最大的特色在於政治性由上而下的集體動員，經由縮短學制、簡化訓練，乃至於特殊化麻風醫生這種專門科別，促成了一個廣袤也細密的診療追蹤之網。這些成果並不是憑空長出，而是建立在過去既有的醫療衛生體系與知識的基礎之上，這個事實也顯出中國這個後帝國實驗當中蘊含的矛盾張力。

三、另外一些在本書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則是書名標題中的疾病隱喻以及麻風醫生工作所需付出卻常被忽略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這些概念貫穿了這些醫生在各種邊緣之境（地理、政治、資源、社會認可程度各層面）的勞動特質，因而更為突顯了麻風防治事業的艱難處。《麻風醫生》提到1949年以後，麻風在共產黨領軍的中國成為防治的重要對象，主要是由於這個病與鄉村衛生以及勞動群眾的連結；更大的層面上來說，

防疫抗病也成為新成立的政權自我正當化的重要行動。麻風從歐美情境下的宗教意涵轉變到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意涵，也意味著麻風背後連帶的社會污名與隔離趨勢，連同被簡化乃至於曲解的科學主義，使得麻風醫生與麻風病人一同進入被邊緣化的循環。這樣的邊緣化在某些動盪的時代，如文革期間層出不窮的批鬥與檢討所產生的傷害，或許有些障蔽危難的效果，但整體來說，邊緣化也迫使麻風醫生處在一個極為尷尬的處境，且常常顧不及家庭與自我的渴望，在為群眾服務的信念中承擔極大的犧牲並不得不消化由之而來的情緒。這也成為麻風醫生自我形塑與認同的特色。

《麻風醫生》一書的章節安排，基本上是依循著時間的順序，並兼及不同時期的發展主題。第一章主要是藉由引述世界乃至於中國早期的麻風防治與隱喻，來定位日後毛澤東時代以降的防疫動機與實際規劃。但作者也指出毛澤東時代的麻風防疫，一反國際間消除隔離措施以削減社會污名的主流意見，反而以政治污名作為動員策略，而逐漸趨向設立以隔離為目標的麻風村。

第二章則集中描述1950年代，中共政府接收既有的醫療院所（當中顯多是原先宗教組織建立的醫院），進入社會主義式的、向蘇聯老大哥靠攏的醫療體系，並在山東、廣東、北京、上海、江蘇等地紛紛培育麻風防治人員。第三章則描述麻風防治在同時期中國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下，也面臨集體化而形成隔離性的聚落。聚落的產生帶來了聚落內外新的性別與權力關係，也形成新的社會關係與距離。這包括了麻風醫師為了防治工作而長期疏離家庭，也因為麻風的連帶污名效應而必須保持低調，另外也包括聚落內的兩性問題。這些社會脈絡同時也是麻風醫生長期的情緒勞動的背景條件。

第四章則延續著情緒勞動的主題，以江澄、黃文標、鄔佩璋、胡鷺芳四位醫師自入行到資深的歷程，以生命史的觀點描述他們如何克服性別、階級等差異所帶來的生活挑戰和情緒勞動而持續投入在工作之中。第五章則集中於文化大革命對於麻風防治的深遠影響，包括形式化科學主義的防疫實作以及更為深化的麻風污名。文革對於知識分子的侵擾迫害、日後

衍生出來的軍事管理，同樣地影響到防治的實際場域，但在風雨飄搖中，麻風村內則相對地較為平靜，麻風醫生們在困難中努力吸取僅有的知識，強化防治的效果，但整體而言，此時期麻風防治的地域差異可以說相當明顯。

第六章則關注文革後改革開放時期中的麻風防治，尤其是國際組織以雙邊或多邊合作的模式進入某些麻風狀況相對較差的區域，使之成為國際試驗的場域，但不同的國際合作策略與樣貌，也區分出麻風醫生之間防治取向的差異。第七章則延續第六章的討論，集中於描述麻風防治在疾病之外的其他努力，包括爭取解除婚姻法的限制、著眼於麻風病人的社會性困難，但同時，市場開放也導致基層人力撤退，產生麻風村去機構化的後續照護問題，教會力量亦重新介入。於此，麻風防治似乎淡出治理圖像，但是這段歷史與其中流轉延續的疾病隱喻卻與國家政治路線糾結難分。

就主題與深度而言，《麻風醫生》都開創了麻風研究的新局面，然而也開啓了幾個值得讀者繼續深思的問題。第一，本書明顯地對於麻風醫生的邊緣處境與情緒勞動寄予敬意與同情，某些片段的描述也讓讀者深切地感受到這些「老麻風」對於病患權益的全心投入與無怨無悔，例如文革時期起草抗議所謂的「八一七文件」（見第五章）或是日後解除婚姻法對麻風病人的歧視（見第七章）。但是當我用本書當成課堂討論教材時，修課同學好奇地指出，本書似乎並沒有更批判性地審視麻風醫生本身作為政府控制麻風病人的角色。這讓我想到自己熟悉的精神醫療領域常見的討論主題，也就是照護與控制有時候常常只是一體兩面。就本書來說，麻風聚落的形成應該可以看成是這種照護與控制的雙重呈現，然而除了強制性隔離所產生的空間性控制，麻風醫生是否還扮演了這個機制當中較為軟性而溫和的規訓性控制呢？這是值得後續研究者繼續深思的問題。

再者，倘若我們引入東亞的比較視野，去思考《麻風醫生》對於同時期的東亞社會的特殊性，我們會得到什麼呢？當麻風治療摒棄了隔離方式而採用社區模式，麻風患者面對的議題就變成國家如何協助他們回歸社會、接受治療、追蹤疾病進展，並面對社會既有的污名與錯解而生存下

去，這在臺灣或者日本的麻風治理歷程當中似乎相對明顯。可以說在社區醫療的模式中，麻風病人所需要爭取的是新的公民身分與權利，相對的，醫師角色也會逐漸趨近於單純的醫療提供者，而將監控、追蹤、紀錄、復原等工作轉交給公共衛生體系的其他成員。然而在本書中，由於麻風村的持續存在，健康照護與公共衛生體系的分化與麻風患者的新公民身分似乎較不明顯，我們也難以比較麻風病患的公民身分與麻風治理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與變化，相較於東亞各國來說，到底是越發趨同還是保持殊異。

這兩個提問並不是針對《麻風醫生》的批評，而是在該書激盪之下啓發的思索。整體來說，《麻風醫生》是本窮盡時代人情、反思歷史政治的成熟著作，值得細細咀嚼。

引用書目

- Leung, Angela Ke Che. 2009.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tuart. 1996. "When was 'the Postcolonial'? Thinking at the Limit," in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edited by Ian Chambers and Lidia Churti, pp. 242-260. London: Routledge.